

# 解读北斗生《中国文坛闲话》

## ——周作人与1923年前半的日中文坛——

伊藤德也

论文摘要：《中国文坛闲话》本来是日语文本，发表在日文杂志《北京周报》上。日文原题是「支那文坛无驮话」。署名是“北斗生”。本文从几个方面具体、详细地确认北斗生就是周作人，《中国文坛闲话》是一篇周作人用日语写的文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周作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尖端文学者，站在日中两国现代文学史的交叉点，面临着俄罗斯革命以后的国际性文化奔流，探索文艺者应该持有如何态度。

**关键词：**日语文本 《北京周报》 颓废 耽美派 普罗文士 革命文学

标题的《中国文坛闲话》或许有人没听说过。没听说过的读者，请看拙文《周作人的日语佚文《中国文坛闲话》》（《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2期）。《中国文坛闲话》这篇文章本来是用日文写的，发表在日文杂志《北京周报》第69号上。登载日期是1923年6月17日。日文原题是「支那文坛无驮话」<sup>1</sup>。署名是“北斗生”。我推定“北斗生”就是周作人。

文章前边有“记者”附记写道：“北斗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权威，是对日本文学有深刻的研究的人物。《中国文坛闲话》是他自己写的日语文章。”所以要

---

1 原文影印载于《周作人研究通信》第7号，第40-41页。

认定他是北斗生，首先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北斗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权威。(2)北斗生是对日本文学有深刻的研究的人物。(3)北斗生是能写日语文章的人。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人到底是谁？当时的中国文学界的权威的话，他可能是胡适，但是胡适没有对日本文学深刻的研究，他完全不能写日语文章。北斗生又可能是鲁迅。的确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鲁迅也许满足这三个的条件，但是1923年6月的时候鲁迅在文学界的权威不如周作人，而且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周作人比鲁迅更深刻更有名。周作人当时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日语文章，再说他的日语文章写得很通顺，周作人写日语文章可能没什么困难。所以从最基本的条件来说，北斗生最有可能的是周作人，而其他人几乎没有其可能性。记者说北斗生自己写这篇文章，那么“北斗生”这个署名也应该是自己起名的。有人肯定能想起来，周作人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北斗”为自己的笔名的事实。

下面从几个方面具体、详细地确认北斗生就是周作人，《中国文坛闲话》是一篇周作人写的文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周作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尖端文学者，他站在日中两国文学史的交叉点，面临着俄罗斯革命以后的国际性文化奔流。

## 一 1920年代初期周作人的日语文本——在武者小路实笃的杂志上

北斗生是个非常高水平的日文写手。先看看周作人的日语写作的情况。

周作人发表的第一篇日语文本，据管见，是《北风》的日语版，刊登于《新村》第二年八月号（1919年8月）。周作人在《访日本新村记》（1919年9月1日记）里写道：“房子〔武者小路〕夫人的一块绫上写了我的《北风》一首诗，又将这诗的和译〔日语翻译〕为松本〔长十郎〕君写了一张。”看来他把自己的中文诗当场翻译成了日文。日译《北风》的日语语法上虽说有一点不自然之处，但是意思通顺，读起来很有风格。无车（武者小路实笃）在《新村》第二年八月号后记里说：

周作人兄的诗是把自作的诗自己翻译的，他说如有不好的地方请修改，但我觉得一字也不用改，所以一字也没修改。有一两个说法日本人一般不说，但我想反而发出独特的趣味。其他的完全成为日文，有趣。周作人兄十分拥有可以做一个日本诗人的素质。

可谓其日语水平相当高。发表的《北风》日语版是用汉字和片假名写的。

然后新村同人川岛传吉把周作人1919年9月16日写的日语书信发表在《新村》第二年十月号（1919年10月）的后记里，也是很通顺的日文。是用汉字和平假名写的。发表在《新村》第三年五月号（1920年5月）的《小河》日语版相当有篇幅。也是用汉字和平假名写的。据末尾附记他把《小河》翻译成日语的日期是1920年3月28号。《新村》第三年五月号里引人注目的是新村同人永岛直昭引用的周作人的书信的一部分。写道：“那首诗[《小河》]是去年[1919年]一月左右中国人正恐慌过激派的袭来的时候想要描写一部分所谓知识阶级的心情作的。”周作人写《小河》的实际日期是1919年1月24日。正符合实际情况。当时日本人把俄罗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叫做“过激派”，周作人也沿用了日本的做法。《新村》第三年十二月号（1920年12月）上也有周作人的日语书信。这是1920年10月20日周作人写给新村同人长岛丰太郎的信。

然后1920年武者小路实笃创刊《生长的星群》，周作人的日语文本也常常出现在该刊物上。《过去的生命》、《苍蝇》、《孩子》、《慈姑的盆》、《小景》的日语版载于《生长的星群》第1卷第6号（1921年9月），另外一首《孩子》载于第1卷第7号（1921年10月），都是他自己翻译成日语的。《生长的星群》第1卷第9号（1921年12月）上发表《西山小品》两篇，众所周知，《西山小品》是先用日语写，发表在日文刊物后，自己翻译成中文再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西山小品》虽然关注的学者很少，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在日中比较文学史上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作品<sup>2</sup>。《生长的星群》第3卷第5号（1923年5月）上有《周作人兄最近的消息》，引用他1923年4月6日写给木村莊五的书信全文。

周作人写道：

中国的文艺界这三、四年来稍微活跃起来了，但还没有出现可观的东西，似乎预兆也没有。也有爱好文艺的青年，可是更多的走向政治外交方面，我觉得这不是好现象。此刻现在中国青年都醉于国家主义的酒，这么说也不算夸张。虽说他们不会发疯起来，但是我们好不容易一直播下来良好的种子，够会变成白播。现在怎么样的乐观家都讨厌起青年来，不怎么乐观了。反对国家主义的一部分青年要作出颓废 [原文：デカダン] 文艺，这是当然的事，我看他们会成为中国文坛最大的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写的日期（1923年4月6日）和最后的内容。周作人写这封信是北斗生写《中国文坛闲话》的仅仅前两个月，都提到“颓废 [デカダン]”。这是偶然吗？

## 二 周作人与《北京周报》的关系

发表《中国文坛闲话》的《北京周报》是1921年创刊的日文杂志。主要读者是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北京周报》创刊之前的1921年10月30日在大陆饭店招待宴请北京文化人士吃午饭。周作人是其中之一。《北京周报》从1922年到1926年之间常常刊载有关周作人的文字。

第一篇是采访记录《中国的新思想界 北京大学教授 周作人》，发表于第6号（1922年2月26日）。这篇文章不是周作人自己写的，而是记者采访后整理而写的。《北京周报》上的文字差不多都是这种东西。应该注意《北京周报》跟副刊或文艺杂志那种刊物有根本不同。《中国的新思想界 北京大学教授 周作人》

---

2 关于这个问题的初步的探讨，请看伊藤德也《生活的艺术：与周作人——中国的颓废现代性》（勉诚出版，2012年）第9章。伊藤德也《周作人〈西山小品〉的诸问题——在于日中新文学史上》中又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发表于《周作人研究通信》第8号（2018年，6月）。

也不是第一手资料，也不算是周作人的著作。第6号还有《文化之钟》栏目，里面提及爱罗先珂住在周作人家，说明爱罗先珂住在周家的理由，指出周家有很多会日语的人。这种消息肯定是记者从周作人或鲁迅那里得到的。第12号（1922年4月9日）有丸山昏迷采访整理的《反宗教同盟和赞成与反对的两派》，里面介绍周作人的反对意见和李大钊的赞成意见。丸山给周作人的标题是《让个人自由》，给李大钊的标题是《宗教妨碍进步》。都不是两个人的著作，只是采访记录。14号（1922年4月23日）的《京城的人们》栏目是《周作人氏》。署名“昏迷生”就是丸山昏迷的笔名。提到周氏访问新村、生在绍兴、起明仲密等笔名、章太炎门下、周树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日本现代小说集》、夫人是东京本乡人等等，写得又详细又具体。丸山昏迷的采访非常周到。

1922年从5月到8月周作人把当时中国小说（叶绍钧《一生》、冰心《爱的实现》、鲁迅《孔乙己》、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翻译成日语发表于《北京周报》14、16、18、30、31号上。这些日语译文都可算是他的著作。周作人《关于《爱的实现》的翻译》（1922年8月28日刊《晨报副镌》）就反映了这些翻译的事情，说：

到了夏天，有日本的知人在北京刊行杂志，嘱我做点文章，我因为自己发不出什么议论，便改变方向，想来尝试译点小说。[···中间省略···]  
先译了《隔膜》里的叶绍钧君的《一生》，以后第二篇才是冰心女士的《爱的实现》，第三篇是《新青年》里的鲁迅君的《孔乙己》，第四篇是《创造》季刊里的成仿吾君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

文中的“日本的知人”是丸山昏迷，“杂志”就是《北京周报》。

然后1923年1月周作人在《北京周报》上开始连载《端呗和都都逸》。他把日本俗谣“端呗”和“都都逸”翻译成中文，也算是个他的著作，从47号到51号连载了四次。而1923年4月22日的《北京周报》第62号刊载的《中国新

文学的前途 北京大学教授 周作人》，是采访记录，不算是周作人的著作。而且没谈什么“中国新文学的前途”，只是向日本读者介绍文学革命和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发表《中国文坛闲话》的两周前就是1923年6月3日，《北京周报》第67号刊载《“面子”和“门钱”两周氏谈》。两周氏就是周作人和周树人（鲁迅），也是采访记录，不算著作。

《北京周报》记者丸山昏迷为了采访常常访问周家，跟周作人交流极为频繁，周作人日记上也常常出现“丸山”这个名字。比如：

1922年5月25日 下午为北京周报译冰心小说未了

1922年5月26日 上午译小说了寄丸山函及件

我们看看《北京周报》就会发现1922年5月28日的第18号上有冰心的《爱的实现》的日语翻译。周作人日记1922年7月16日项有“寄丸山译诗五首”，7月23日的《北京周报》第26号上就有周作人把自己的白话诗翻译成日语的《诗五首》<sup>3</sup>。1922年8月周作人日记有如下记载：

1922年8月23日 上午为丸山译小说未了

1922年8月24日 上午译文了···[中间省略]···下午寄丸山稿件

而8月27日的《北京周报》第30号和9月3日的第31号连载成仿吾的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的日语翻译。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个“稿件”就是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可见周作人日记的可靠性非常高，周作人把什么东西寄给丸山就意味着他向《北京周报》投稿什么。

1923年4月18日项“丸山来谈”可能是指4月22日发表的《中国新文学

3 “五首”就是《东京炮兵工厂同盟罢工》、《愚人的心算》、《慈姑的盆》、《秋风》、《歧路》。

的前途》的采访。据周作人日记，从3月到6月之间丸山来周家的有3月18日、4月8日、4月18日、5月10日、5月26日，每月一、两次。其中3月18日，4月8日，5月26日他们在周家一起吃饭。还有4月15日在中央饭店一起吃饭。收到丸山的信或者给他寄信有3月17日、4月14日、4月24日、6月8日、6月9日等，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6月8日项。写道：“作杂文一寄与丸山”。这说明周作人6月8日写了一篇杂文当天就寄给丸山。如果周作人把文章寄给了丸山，肯定就跟《北京周报》有关。当时6月间的《北京周报》上没有周作人自己执笔的著作。而《中国文坛闲话》的末尾有（六、八、）的记载，表示北斗生6月8日把《中国文坛闲话》写完了。那么，不推定“北斗生就是周作人”就很不自然了。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北斗生”就是周作人，《中国文坛闲话》是一篇周作人用日语写的文章。

### 三 1923年前半的中国文坛与周作人

周作人是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之一，当然对运动的将来很关心。前面我们看过1923年4月6日他写给木村莊五的书信。他在里面说明了中国的文艺界的概况，并且指出“反对国家主义的一部分青年”所要作出的“颓废文艺”“会成为中国文坛最大的势力。”1923年6月他写了前半篇《新文学的两大潮流》<sup>4</sup>，他在冒头说：

中国新文学的趋势，将来当分为两大潮流。用现在的熟语来说，便是革命文学与颓废派。这两者的发达都是当然的，而且据我看来，后者或要占更大的势力。

可见他的观点（“颓废文艺”会成为中国文坛最大的势力）有一贯性。而北斗生

---

4 这篇文章的成立比较复杂。有关详情，请看伊藤德也《《新文学的两大潮流》如何写成，如何刊行的？》（《周作人研究通信》第2号，2014年）。

在《中国文坛闲话》里写道：

现在最新的文学运动当然是颓废 [原文：デカダン]。这个又可以分为两派，即：一派是北京的英国式的耽美派，另一派是上海的从日本学来的普罗文士他们。

北斗生所说的“普罗文士”就是一些受到俄罗斯革命的影响而提倡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文艺的文士，相当于主张所谓“革命文学”的文艺者。北斗生的用词从现在看来，比较特别，有人可能觉得奇妙，因为他所说的“颓废”里面好像包括“革命文学”那样。“耽美派”这个字面一般来说中文里极少用，当时现在都不太用，是我翻译时从北斗生的日语用词直接沿用过来的。北斗生的用词“颓废 [デカダン]”和“耽美派”之间有一定的区别。“颓废 [デカダン]”是比“耽美”更旷阔的概念。他所说的“颓废”都包括“革命文学”和“耽美派”。所以周作人《二大潮流》的观点跟北斗生《中国文坛闲话》的观点并不一致。然而不能否定周作人的观点和北斗生的观点之间有相当浓厚的对应关系。

先从结论来讲，我们不十分了解周作人的独特的“颓废”观念的本质，就不能十分了解这个微妙的关系。探讨周作人所拥有的“颓废”观念的本质就是我的日文著书《“生活的艺术”与周作人——中国的颓废现代性》<sup>5</sup>的中心题目之一。简单地讲几句，周作人所说的“颓废”是广义的“颓废”，是指没有实际行动的行为 / 表现形式。所以文学文艺都就是“颓废”。不是“颓废”的是，例如；根据国家主义来加入军队参加国家战争，或者参加某一个政党实现种种政策等等，这些才不是“颓废”，所谓“革命文学”不是实际行动的形式，所以完全是“颓废”。如果北斗生就是周作人的话，北斗生的用词也可以理解，假如不是，北斗生的用词就是奇妙而已。

---

5 勉诚出版，2012年。



再说，周作人所说的“颓废派”和“革命文学”太不一样了，有明显的区别。而周作人所说的“颓废派”和北斗生所说的“耽美派”也有一定的区别。关于这个区别，请看拙文《与耽美派相对立的颓废派：1923年的周作人和徐志摩、陈源》<sup>6</sup>。世界文艺思想史上，这两派基本上是一个东西，但是对周作人来说，英国式的“耽美派”往往忽视人情，容易陷入艺术的非人化，是跟他所说的“颓废派”“有所不同的，甚至也有相互对立的東西。

即使周作人的“颓废派”和北斗生的“耽美派”不一样，至少可以说周作人1923年当时感觉到中国新文学里的大变化，就是新兴潮流的出现。这个新兴潮流并不是有关作品的（形式上的或内容、题材上的），而是有关艺术者的基本态度的。关键的问题是艺术者到底对社会采取如何态度的问题。再说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并不是新兴的问题。1922年初他发表短文《自己的园地》，一边否定“为艺术的艺术”，一边否定“为人生的艺术”，确认自己的态度是“人生的艺术”<sup>7</sup>。换句话说，他都要反对艺术的非人化和工具化。1923年6月他感觉到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奔出，虽然具体表现形式完全是本土化的、又具体又活跃的。

他6月8日作为“北斗生”用日语写《中国文坛闲话》指出：“最新的文学运动”是“耽美派”和“普罗文士”。所说的“耽美派”和“普罗文士”是有非常具体的很明显的对象，就是徐志摩、陈源和创造社同人尤其是成仿吾。而这些具体的对象对当时的周作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的名字常常出现于周作人平常看的杂志上或者其中有人大大公开批判周作人。《中国文坛闲话》里有很多引用，这些引用都非常忠实于原文。先确认这些引用的情况。前半半论及徐志摩和陈源，北斗生把他们的文章的一部分翻译成日语就用引号如下引用。

我不幸没有直接接触他们二君的高论，但是看了他们发表的文章就知道他们是耽美主义者。先生们说：“戏剧的根本作用是使人愉快的。”“主义都是浅

6 《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

7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初出于1922年1月22日《晨报副镌》）

薄的，至多只是艺术的材料；若然他专为主义而编戏他便是个 doctinaire，不是个艺术家。”

其中“戏剧的根本作用是使人愉快的。”是西滢（陈源）《看新剧与学时髦》里的一句，“主义都是浅薄的，至多只是艺术的材料；若然他专为主义而编戏他便是个 doctinaire，不是个艺术家。”就是徐志摩《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里的一段。两个人的文章都载于1923年5月24日的《晨报副镌》上。翻译的态度几乎是逐字逐句的“直译”，原文的英语“doctinaire”日文翻译也是用罗马字写“doctinaire”。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北斗生用日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手里有《晨报副镌》原物。众所周知，1923年当时周作人跟《晨报副镌》的关系尤为密切。当时周作人发表文章主要载于《晨报副镌》上，肯定每天看《晨报副镌》，手边就有《晨报副镌》原物。北斗生提到徐志摩和梅兰芳的关系，也提到提琴家克莱斯勒来到北京开演奏会的情况，这些消息都载于《晨报》<sup>8</sup>上，周作人也当然看过。北斗生又说“也许是我的偏见，北京的耽美派似乎颇有王尔德的臭味道”，而周作人后来把陈源和徐志摩叫做“王尔德们”<sup>9</sup>，把陈徐俩看成王尔德之类的人物。北斗生和周作人对陈徐两个人的看法和说法完全一致的。

《中国文坛闲话》的后一半讲创造社同人尤其是成仿吾。这里也有引用。例如，北斗生说：

〔《诗之防御战》〕对于有人介绍日本的短歌，狠狠地批评说：“把日本人自己也已经不要的东西捡起来叫中国青年模仿，到底是什么意思？”

8 《满场心醉，喀拉士之妙技 听众如潮全场无立锥余地》（《晨报》5月29日）等。

9 周作人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1925年11月23日《语丝》第54期）上写道：“还有些人好意地称《语丝》是一种文艺杂志，这个名号我觉得也只好“壁谢”。现在文艺这两个字十分威严，自有许多中国的王尔德们在那里主持，我们不配也不愿滚，混进里边去，更不必说《语丝》其实不是专门卖什么文艺货色的。《语丝》还只是《语丝》，是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不伦不类是《语丝》的总评，倘若要给他下一个评语。”

北斗生说“有人介绍日本的短歌”，“介绍日本的短歌”的“人”当然是周作人。成仿吾却不掩饰地提到周作人的名字猛烈地攻击他。成仿吾在《诗之防御战》里说：

日本人——俳谐一样浅薄无聊的日本人，已经早为他们奏了蕤露之歌，不知周君为甚拾得他们的残骸，偏要为他们大吹大奏。

这里的引用并不是逐字逐句的直译引用，可能是因为成文里有“奏了蕤露之歌”这种难“直译”的说法，再说北斗生不愿意直接引用成文的露骨粗暴的字句，不必要让日本读者不愉快。北斗生还引用成文里的字句说：

〔《诗之防御战》〕评论有人的诗说：“这是什么东西？滚你的。”“滚你的”这个说法正是“他妈的！”之类的说法不是？

成仿吾《诗之防御战》里评论俞平伯的《仅有的伴侣》时最后说：

这是什么东西？滚，滚，滚你的！

可见北斗生《中国文坛闲话》里的引用很准确。他手里肯定有登载《诗之防御战》的杂志。登载《诗之防御战》的就是《创造周刊》第1期，出版于1923年5月13日，北斗生写《中国文坛闲话》的前三周。北斗生把个人名字（徐志摩、陈源、梅兰芳等）写出来了，但是他没把周作人的名字写出来。我看这是因为周作人不愿意出名，用笔名投稿，文中也不愿意写出自己的名字。另外，北斗生没把成仿吾的名字写出来，但我看是因为成仿吾的说法对日本读者太刺激，周作人写得很慎重了。周的日语译文就把成文的尖刻性大为减少了。

北斗生把创造社同人叫做“普罗文士”，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许多文学史著作说：创造社当初作为一种艺术派出现以对抗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转成左翼提倡“革命文学”是1920年代后半<sup>10</sup>。这件事现在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基本常识吧。但是北斗生早就敏感地觉察到俄罗斯革命后的现代文学的某种倾向。他说：

上海的创造社的同人都是日本的留学生，他们自己称作是颓废派，但从我看，他们称作普罗文士更适宜。从去年冬天起到现在在《创造》杂志上关于误译问题跟胡适博士进行论战（胡适君已经沉默了），猛烈地发挥普罗风格。5月又出了《创造周报》其旗帜更鲜明起来了。第3期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和《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最能清楚地反映他们的主张。可是这两篇文章太正经，虽然很能表现意见，但是普罗文士的精神还没表现出来，这个应该看看第1期的叫做《诗之防御战》的论文。这个批评家在文中统统打败所谓专卖中国的诗坛的人们了。他的武者那样的态度实在厉害。

创造社1921年成立，1922年5月创刊《创造季刊》。当时创造社成员都是无名的青年，本来对文学研究会等既存文坛有些意见。1923年4月郭沫沫、郁达夫、成仿吾陆续集合在上海，5月13日创刊了《创造周报》，第1期上有北斗生提到的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第3期是5月27日出版，北斗生写《中国文坛闲话》是6月8日，他看刚刚出版的东西就写了这篇文章。

周作人日记里有关创造社的记载如下：

1922年9月7日 晚得上海寄创造第二期一本

1922年12月2日 得雁冰函上海寄创造三号一本

---

10 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更准确地说是1926年郭沫沫若在《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文艺家的觉悟》等几篇文章以后的事。

1923年2月11日 郁君来访赠创造一本

1923年5月15日 得创造二卷一号一本

我们上边看过周作人1922年8月把成仿吾《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翻译成日语发表于《北京周报》。《一个流浪人的新年》本来载于《创造季刊》第1期，出版于1922年5月，周作人手里当然有《创造季刊》第1期。虽然日记上没有有关《创造周刊》的记载，1923年5月15日的“创造二卷一号一本”很可能是《季刊》第2卷第1期，而不是《周刊》第1期，然而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周作人一直关注创造社。周作人完全没有在自己的中文写作中提及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但是毫无疑问一直关注创造社的周作人看到这篇文章受到了一种冲击<sup>11</sup>。

#### 四 周作人看当时的日本文坛

北斗生（周作人）在《中国文坛闲话》里写道：

“滚你的”这个说法正是“他妈的！”之类的说法不是？感觉好像看日本的前田河骂人的评论那样。很像“西蒙”的口吻，太像日本的，像到不必要像的地方，跟拿日本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来卖一样，对中国来说真为难。《创造周报》在文化上倒有排斥日本的东西的倾向。

“日本的前田河”就是前田河广一郎（1888-1957），日本的左翼作家。他的名字现在已经是完全过去的名字了，但是有一段时间他是一位日本文坛上大名鼎鼎的左翼评论家小说家。他1907年去美国，1920年回国。以后，日本的文艺杂志上或者报纸的文艺栏目上常常出现他的名字。他把罗素《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际》*Bolshevism: practice and theory*翻译成日语，1921年出版，还写过几篇小说。

---

11 鲁迅从成文受到的冲击反映在《野草》的标题。有关详情，请看秋吉收《成仿吾与鲁迅《野草》》（《济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北斗生关注的“骂人的评论”是例如：《本年文坛上半年期的阶级斗争批判》连载于1922年7月1、2、4、5日的《读卖新闻》，前田河在这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判河上肇、菊池宽、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里见淳、廣津和郎等作家。1923年他又发表《歪曲的战斗线》讲评当时文坛的状况，其中严厉地批判几个作家。这篇文章登载于《读卖新闻》（1923年2月26日-28日）。他还从1923年5月9日到5月15日把《作家二十二人 五月的创作月评》连载于《朝日新闻》。里面只有批判，没有评价。被批判的有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小川未明、正宗白鸟、横光利一、室生犀星、德田秋声等，就是“骂人”的文章。北斗生认为《诗之防御战》跟前田河的文章差不多，就是骂人的文章。北斗生还写道：《诗之防御战》的口吻“很像‘西蒙’的口吻”。“西蒙”是本来北斗生（周作人）用日语写「シモン」的，但是这是他写错了。正确的是「シムーン」，就是左翼文艺杂志的名字<sup>12</sup>。这本杂志创刊于1922年4月，标榜“扑灭资产阶级”，以后改名为《热风》。基本态度还是跟前田河差不多。这本杂志和前田河一样，除了专门研究日本文学的学人以外，现在几乎谁都不知道。可见北斗生（周作人）不仅仅很了解创造社的详细活动，而且对日本文坛的情况非常熟悉。北斗生把创造社同人叫做“普罗文士”「プロ文士」，据《朝日新闻数据库》和《读卖新闻数据库》，用这个词汇最早的例子是载于1923年1月26日《朝日新闻》的《惊讶于普罗文士》和1925年1月10日《读卖新闻》的《普罗文士》，都是无名氏写的。1923年6月当时用这个词汇的人不多。周作人对日本文坛的理解即使在日本社会里也可算尖端的。

北斗生（周作人）到底是从哪里得到日本文坛的如此详细的、尖端的消息？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国以后订阅了一些日本杂志。这件事我们可以在周作人日记里看到。但是1923年左右的日记里没有日本杂志的记载。他当时写了几篇有关

---

12 拙文《周作人的日语佚文《中国文坛闲话》》（《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2期）发表时还没有把握北斗生所说的“西蒙”到底是什么。这次搞明白了这件事，我们才明白了周作人《有岛武郎》里为何提到“热风”。请看下文。

日本文人的文章。《森鸥外博士》写于1922年7月24日，载于7月26日的《晨报副镌》。他在文头说：“据日本新闻的报道”（“新闻”是日语。报纸的意思。）。发表于1923年7月17日《晨报副镌》的《有岛武郎》说：“阅七月九日的日本报纸”。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周作人当时阅读日本报纸。查查他的日记，就发现1921年12月17日他“寄读卖新闻社金五圆八十钱”，1923年5月3日“寄读卖新闻社金五、七五”。他从1921年12月到1923年5月之内给读卖新闻社送两次6圆左右的钱。我看周作人当时一直订阅《读卖新闻》。《读卖新闻》几乎每天都有文艺栏目，所以或许可以说周作人基本上从《读卖新闻》获得日本文坛的消息的。

回过头来说，他关注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本来出于俄罗斯革命以后的世界情势，要回避不必要的混乱和暴力，赞同“新村”的精神，鼓吹“新村”运动。上边我指出北斗生所提到的“西蒙”是1922年创刊的左翼文艺杂志，标榜“扑灭资产阶级”，以后改名为《热风》。周作人后来隐晦地提到这个杂志。他哀悼有岛武郎的死时写道：

有岛君死了，这实在是可惜而且可念的事情，日本文坛边的还乙那（Hyaena）将到他的墓上去夜叫罢，“热风”又将吹来罢，这于故人却都已没有什么关系。<sup>13</sup>

里面的“热风”为何有引号？因为周作人要暗示这个左翼文艺杂志的名字。有岛武郎是《热风》等“普罗文士”的攻击对象之一。其实有岛武郎写了《宣言一个》（1921年），表现他对自己的阶级性的懊恼。但是日本文坛的“普罗文士”们毫无留情地批判他。就像中国文坛的成仿吾批判周作人他们一样。对周作人来说，日中两国的“普罗文士”是为了革命什么都猛烈地工具化的文艺者。周作人

---

13 周作人《有岛武郎》（初出于《晨报副镌》1923年7月17日）。

反对文艺的工具化，也反对非人化，虽然他也很理解“革命文学”和“耽美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他用北斗生这个笔名写日语文章《中国文坛闲话》是1923年，俄罗斯革命发生6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说“俄罗斯革命的时代”是从1917年开始到1989年（或者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的话，周作人面临“俄罗斯革命的时代”的最初期，站在日中现代文学史的交叉点，非常具体地观察日中文坛的详情，来探索文艺者应该持有如何态度。